

《史匯》
第二十六期，頁 1-7
2024 年 8 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華人公民社會的典範：

讀黃進興等著，胡曉真主編：《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

梁右典*

Liang, Yu-Tien

書 名：《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

作 者：黃進興等著，胡曉真主編

出 版 地：臺北市

出 版 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日 期：2023 年 2 月

頁 數：200 頁

余英時先生在華人世界與公民社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是當代最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之一。他的「著作」與「志業」恰好可以說明為何能在當今社會造成廣泛作用，換言之即是他的著作呈現專業的史學研究，以及以學術做為志業的「一以貫之」精神。如今讀其著作，余先生好像未曾離我們遠去。尤其是透過許多追思紀念的文字，更可以讓我們遙想余先生的種種形象，並確切感受到余先生對於後進學者的提攜與啟發。其中追思紀念文字，比較特別的是 2021 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規劃「余英時院士紀念專輯」，由王德威教授與胡曉真教授主編，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 卷 4 期（2021 年 12 月），如同該專輯前言所說：

* 黃岡師範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為表達對先生的敬意與思念，我們重溫他的重要著作，並以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給青年一輩學者，以期實踐薪火相傳的意義」。此專輯於兩年後再出版為專書，流通更為便捷，這是書中胡曉真主編《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一書問世的原由。本書在專輯基礎上，則是再收錄陳來教授的紀念文、黃進興教授從學余先生的回憶、以及唐小兵教授的文章；更令人驚奇的是，書中收錄許多余先生照片，甚至還有一張余先生早年「粉墨登場」演出之照片（頁 34），這是 1969 年余先生於美國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出京劇《二進宮》老生楊波之京劇照。

《閱讀余英時》此書最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余先生的學術與人格對於學者的影響是跨世代的；現今學界熟悉的詞彙包括：內在理路、實證與詮釋、價值系統、整體的文化動態、典範意義、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等等，仍持續在當代學界論述過程中發揮它的影響作用。比較讓人好奇的是：學者們是如何認知與感受余先生對他們的啟發，具體的內容是什麼，對當今社會有何助益，如今學者們又有什麼樣的論述引伸，試就以上問題再做說明：

一、學術遺產的思索：

余先生已在許多地方談及或說明做學問最重要的不是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以能夠發前人所未發為目的；相反的是，而是要認真下苦工，透過字裡行間，進入古人的精神世界，設身處地為其著想當時處境，究竟展現什麼樣的思想樣貌。學者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將其所處時代氛圍與研究對象的學術生命能夠緊密聯繫起來。他所研究的方以智（1611-1671）、章學誠（1738-1801）、戴震（1724-1777）等人，余先生無一不是抱持如此研究信念，於是我們看到闡述的對象是具體生活於情境中之「人」，透過學術呈現他們的「精神遺產」，當代學者不斷解讀研究對象之心境，如以明遺民之隱語方式為例，學者任務即是要為其「解碼」或「譯解密碼」（decoding），也就是廖肇亨〈溶實證與詮釋於一爐：寫在《方以智晚節考》初版發行五十週年〉引用余先生的話：「惟有實證與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為用，庶幾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見古人之心耳」（頁 11）。古人之心化成其言，其言反映時代，時代之內涵透過學術議題得以彰顯，這是史學家對於研究內涵的深入思考。

二、獨立自由的追求：

眾所周知，錢穆（1895-1990）與陳寅恪（1890-1969）的學術精神深深影響余先生，前者帶領他認識中國文化，開啟研究中國歷史的眾多法門；後者則是陳先生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語對於余先生有重要影響，如同王德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文提及那是「余先生心嚮往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頁33）。正如1929年陳寅恪〈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頁33）。正如上述師承與前輩的啟發，使得余先生對於歷史上的「士」有更為親切的認識，以及明白歷史研究並不是僅從史料當中尋求證據以證成一己之假說，正如余先生自道「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於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頁32）。因此，歷史文化就不僅僅是客觀認識的史料分析，也並非主觀臆測的產物，而是透過嚴謹的歷史研究，他「堅信歷史文化的最大意義乃在於它提高了人的價值」（頁136）。¹而且這樣的價值需要不畏艱難、持續傳承下去，唐小兵〈二〇二一，春風遠矣——敬悼余英時先生〉就提到「余先生很鄭重地告誡我不管時代如何巨變，世道如何艱難，都要將真正的知識與文化傳遞給下一代，用他廣為流傳的話來說，就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頁148）。

三、歷史現象的解釋：

余先生學術研究重點在於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各樣變化，從中勾勒價值系統之意義；亦關注中國思想如何在承平時期的運作，也當觀察中國思想在變動時期如何發展。正因為有「價值」、「典範」、「認同」等等核心概念在文化內部之中，所以歷史學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將此概念清楚呈現出來，進一步論述在此歷史過程發揮何種作用，扮演何種角色，彰顯何種意義。正如蔡長林〈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遺產〉提到「余先生認為，決不能籠統地說清代經學考證單純地起於對宋明理學的反動，這樣的說法只是一種對歷史現象的描寫，不足以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解釋」（頁18）。歷史現象的解釋是余先

¹ 余英時：《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收入《余英時文集》第6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25。

生留下給我們寶貴的文化資產，因為若不經由解釋，即使有許多史料，但仍無法看出當中意義，而淪為流水帳的記敘，無法凸顯歷史的多方意義。另一方面來說，歷史現象的解釋也不能僅僅限於內部的考察，還要置於外部其他歷史文化的對比，如此才能整體看待該議題、該領域的整體變化為何。呂妙芬〈史學大師的思想史視野——從《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談起〉提到余先生的一句話是如此表述——「比較思想史的研究必須著眼於體系的整體變化」（頁 81），並指出這是余先生對所有後學的重要提點（頁 81）。

四、師友情誼之交流：

余先生對於學生不僅是師生關係，更多的是朋友關係的延續；師生因學業而盡，情誼卻是終生長存。在亦師亦友之間，余先生的天地世界更為人所知所識，而不僅僅侷限於他的學術志業。黃進興〈師門六年記：1977-1983〉敘述自己如何從「批余小將」（頁 105），到最後受余先生的治學精神感召，體會「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頁 112）。黃進興亦從課堂之外看到余先生的另一面是——「為黨外仗義直言」（頁 115），以及為臺灣培育不少人材，例如：洪金富（1946-2019）、丁友、康樂（1950-2007）、陳弱水、周婉窈等臺灣的留學生（頁 115）。王汎森〈建立「海外文化王國」——余英時先生 1960 年代的一個構想〉提到余先生於 1963-64 年間最為熱衷此事（建立「海外文化王國」）；並指出「實現這個王國的步驟之一，是儘量幫助同學、師友們找到好的教職，所以他像一位大俠般岌岌道途為他們找工作」（頁 119）。余先生真正能夠為朋友儘可能提供幫助，留下讀書種籽，希望後進能有真實的成就，而不是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樣的「運動」。此外，大陸學人陳來〈與余英時先生的學術交往雜憶〉也從自己與余先生的學術交往面向看到「余先生對國內學人學術的關心、支持的一貫態度」（頁 170）。

五、天人之際之思想：

眾所周知余先生最後一部學術著作是 2014 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日後有許多學者對其進行述評，本書收錄范麗梅〈從巫術文化到現代科學——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重要觀點的繼承與發展〉更認為「天人合一」

雖然是古老命題，但透過余先生著作啟發，「更預示這是一個現代甚至未來的命題，值得繼承發展、著力深論」（頁 101）。余先生談論的中國思想議題，我認為「天人之際」是余先生所有著作中最能彰顯比較文化的觀點，並置於世界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亦具有跨國性的歷史、哲學與宗教色彩。但是，天人之際的思想研究又不單單僅是學術議題的意義，還可以延伸至他對宇宙人生的看法；葛兆光〈通古今之變者，必究天人之際——紀念余英時先生〉提到：「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這是屬於『天』的境界，但他又始終不渝地關心這個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在交互影響，所以，我願意說，余先生一生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頁 179）。在此歷史問題亦凸顯價值問題在當代的意義，以及學者是否願意從中思索可能的內涵，某種程度上亦呼應歷史學家的「通古今之變」與「成一家之言」。

六、政治文化的省思：

作為歷史學者，余先生關心中國文化內部的政治思想，如何影響人們生活，從中又可以獲取哪些思想資源，成為現今人們可以汲取的活水泉源。鍾彩鈞〈《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就是對於余先生的宋明理學中之政治文化研究而發，指出余先生所謂「秩序重建」說法，是在「內聖外王」中逐步發展，不但是一「連續體」，也仍有其條件與目的之分（頁 73）。如此看法實為重要，因余先生不將內聖之學視為中國文化傳統唯一值得重視之事，而忽略外王領域的種種要求；另一方面，也沒有陌視內聖之學在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與重要性。而在往後的議題開展，可見於丘慧芬〈余英時論中國文化和自由民主接榫的精神資源〉一文對余先生研究的回顧，其中亦涉及「內聖」的現代意涵，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能夠發現並承認、「堅信歷史文化的最大意義乃在於它提高了人的價值」（頁 136）。朱雲漢〈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評介余英時先生大作《人文與民主》〉則提到余先生 2019 年 11 月為政治大學所設立的「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所作的公開演講：「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強調民主體制的運作必須要有健全的文化精神與之配合（頁 95），甚至還有可能為現代民主提供可供參考的資源（頁 96）。

七、典範意義的推進：

每一時代皆有其典範意義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準，各個學科內部亦是如此；以余先生熟悉的思想史來說，可見於他對於胡適歷程研究，當中所呈現的知識人世界，應當如何認識與理解，將當時的典範意義能夠精準把握，並在所處當代社會對於典範意義有所推進，特別在公共知識人的身份上，身處華人社會而言更是難得。黃克武〈五四與反五四的「內在融合」：余英時先生的胡適研究〉提到余先生致胡適函（1956年）中的一段文字：「胡適在國共內戰後談自由主義，談眼前世界文化趨向的演講透過廣播和文字，啟發了一個青年人，讓他在1950乾坤一線之間選擇留在了香港……」（頁44）。此外，余先生也在純粹的學術議題中有所推進，李孝悌〈中國的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胡曉真〈紅學的無窮法門——《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典範意義〉皆分別提到余先生受到韋伯「理性化的過程」的典範啟發（頁69）、以及提醒我們在閱讀《紅樓夢》時「一切典範，最終必然從內部開始發生危機（稱之為「技術崩潰」）」，從而受到新典範的挑戰，然而，原來的典範也仍然會在新典範的運作中繼續發揮效用」（頁24）。

八、終極依歸的探求：

中國知識人的精神世界強調「入世性」，而不重視死後的世界，此涉及對於終極依歸的探求為何。余先生在《中國知識階層史論》、《東漢生死觀》、《論天人之際》諸書皆有談論，對此議題之興趣始終不輟。也是在余先生的著作中最能顯出哲學思辨的議題之一，正如黃冠閔〈魂入世間：價值的呼喚〉提到余先生在「方法論中哲學概念的引入是必經之徑，並以回歸歷史向度的手法使用哲學思想」（頁61）。因此，對於歷史問題當中的起承轉合，不僅僅是事件的演變與勾勒，更是哲學上的認識與體會。李貞德〈讀《東漢生死觀》紀念余英時先生遠遊〉提到余先生在1962年的博士論文，表示「此類壽夭取決於人而非神的觀念，再度反映了東漢人文主義的入世精神，卻也為將來佛教報應思想鋪路」（頁86）。整體來看，余先生所強調知識人的終極依歸是開放性的觀念，雖然從漢人歷史的角度作為觀察中心，但這是對於研究對象有所限定，並非抱持漢人中心主義的思維。而文中所論及終極依歸的探求，可以發現每一時代皆有它的契機與挑戰，端看如何取捨，基本的價值問題，可以修改與變動，但對於生死觀的價值思索，終究成

為知識人在此間最重要的選擇之一，每個人都可以有其對於終極追求的看法。

最後，我想談談在《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這本書中，對於我們有什麼樣的意義。余先生是典型的公共知識人，一方面他的研究毫無疑問建立在無數堅實的史實與客觀分析上，另一方面其中的人物與事件交融一起的歷史面貌，透過余先生的筆下自成大千世界，從他眾多的思想史論著中可見其堂奧。也因為如此，余先生的確將他的著作與志業緊密結合起來，置於歷史長河之中而不孤單，他的所思所思，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是時局分析，也都充分將知識人與公共性兩者充分聯繫起來，這是他今天造成廣泛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人身處於歷史脈絡之中，要能貼近時代，明白所處的時代是如何發展至今，受什麼樣的觀念影響，又是如何支配所處的當代社會。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在思想過程的激發演變中最能影顯出來，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思考，也是與社會有進一步對話的結果。如今我們從《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可以看到余先生的著作仍不斷啟發後進學者，他的志業仍激勵無數對學術有熱情的青年學子，透過閱讀他的著作，余先生確實仍在影響著我們，並走出一條我們苦苦追尋又能安心接受的學術道路與人生幽徑。